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

周忠和在作科普报告

1 “虚荣心”与“表现欲”的驱动

周忠和的人生“剧本”，平铺直叙，按部就班，几无波澜。儿时的经历实在普通，既没有触发对科学特殊热爱的大事件，也没有遇到过影响人生走向的引路人。唯一值得提的，是“自然流露的好奇心被维护且保留了下来”。

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市农村，家乡无山少石，生物多样性简单，儿时的他甚至算不上喜爱鸟类。但他对自然有着天生的洞察力：陪伴他长大的猫狗鸡鸭、房前屋后的飞鸟，与小伙伴一起钓田鸡、观察蚕茧、采集知了壳……他曾执着地储存雪水，想验证“雪水能助植物生长”的说法，虽然首次“科学”实验失败，却让他早早懂得：科学离不开尝试，更接纳失败。没有繁重的学业，与万物相伴，大自然成为他童年最生动的科学“启蒙老师”。

周忠和真正与古生物结缘，始于高中第一位班主任吴凤彩老师订阅的《化石》杂志。即便对古生物学没有任何概念，在课外读物稀缺的年代，杂志里跨越亿万年的远古生命故事，像一道微光吸引着他。高考填报志愿时，他在懵懂间选择了有机化学与古生物学，古生物学因分数略低成为“保底选项”，无意间开启了他一生的事业。

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古生物与地层学时，周忠和的好奇心有了明确的寄托——那些沉睡亿万年的化石。他笑言，最初写科普文，源于“虚荣心”与“表现欲”。父亲常年订阅新华日报，从小学三年级起，读报成为他的阅读启蒙。那时的报纸上，长篇批判文章随处可见，周忠和常惊叹于作者的文字功底：“我写的作文不过豆腐块大小，他们怎么能写这么长？”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写诗撰文成为潮流，每个人都渴望表达自我，而古生物学领域的通俗科普几乎空白，抱着“写出来或许有人喜欢”的想法，周忠和开始动笔。

1989年，周忠和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硕士毕业，读研期间，他便已开始撰写与专业相关的科普文章，第一篇作品就发表在《化石》杂志上。最初，他只是享受写作与传播知识带来的成就感，随着创作深入，科普

# 科普院士周忠和：科学，很酷

□ 本报记者 宫小韵 卢鹏 本报实习生 马广泽

## 2 小众学科，并不冷门

近四十年的研究生涯中，周忠和不是在办公室内研究化石标本，就是跑到野外挖掘化石，“别人看感觉很无聊”，他乐在其中。

提起古生物学，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“挖化石”“玩恐龙”，直接贴上“冷门”标签。周忠和并不赞同，“古生物学是一门小众学科，但不能说它冷门。”

“人少不代表影响小”。在周忠和看来，古生物学所揭示的生命起源、物种演化、环境变迁等规律，帮助人们理解地球历史、生命奥秘，回答人类是谁、从哪来又到哪去的哲学问题，既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，又在无形中拓展科学认知边界、传承科学文化。

对研究人员而言，“古生物学、地质学这类时空尺度宏大的学科，能够开阔视野，让人以更宏观、豁达、超脱的眼光看待自然世界，对社会和人生产生不一样的思考”。而在当下，古生物学在国家战略资源和重大科学问题中的独特价值，自不必说。

## 3 作最有效的科普

周忠和的科普与科研工作始终交织在一起：科研为科普筑牢知识根基，科普让科研走出象牙塔，被更多人看见和理解。

“我一辈子只专注了两件事：鸟类的早期演化，以及热河生物群的综合性研究。”

在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，周忠和又在2025年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。他把成绩归因于“运气好”：赶上了恢复高考、改革开放、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红利，得以学英语、上大学、出国深造、发掘化石。而他的研究方向——热河生物群，恰好成为世界级生物化石宝库。

周忠和的科普之路“断断续续”，却从未停止：硕士刚毕业的几年，科研压力小，是创作高产期；1999年博士毕业，从美国回国后专心冲刺学术，近十年基本暂停；2011年当选院士后，才重新投入更多精力。

近四十年里，他的科普实践覆盖多个层面：主编《十万个为什么（古生物卷）》，担任教科版小学《科学》教材主编，从基础教育筑牢科学根基；每年开展二十余场线下讲座，十多年累计近两百场，足迹遍布高校、党校、博物馆，还远赴港澳台及日本作报告；他还多次提案推动科普法的修订，呼吁完善科普评价体系、保障科普工作者权益，为科普事业鼓与呼。

他坚信科普要追求效率与影响力最大化，“有限时间，要做最有价值的事”。因此他多次走进党校，向干部普及古生物学与科学精神，希望通过影响决策者，带来政策、经费等实际支持。“领导干部的决策影响力大，只要认可基础研究与科普的重要性，就能带动更大层面的改变，影

据周忠和观察，时不时冲上热搜的科研成果，各类科普读物的持续热销，古生物博物馆展区里的人头攒动，都是公众和媒体对古生物学感兴趣的表现，这为科普工作提供了土壤。

现代科学积累深厚，想成为专家必须长时间积累，在一个领域深耕才能做出名堂。不过，周忠和强调，古生物学研究就是坐“冷板凳”这种观点，需要纠偏。

“‘坐冷板凳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坚守，却不能简单从字面理解。科研工作与曝光度高的行业本就不一样，更需要安静的环境、专注的心态，以及对外界诱惑保持理性。”周忠和说。

作古生物研究的科研人员如何认识这门学科，是周忠和始终关心的事。分子生物学、环境科学、空间探索、行星科学等，在近年发展迅速，它们的崛起，无疑会压缩传统学科的生存空间。“学科发展关键在交叉和拓展，新兴学科不断出现，老学科就要自己想办法往前走。”

响面远比给几百个孩子讲课大。”而为教师科普，则能实现“一传十、十传百”的效果，通过提升教师科学素养，惠及更多学生。他调侃自己是“功利主义者”，这种精准取舍，何尝不是一种清醒与智慧。

三十多年来，周忠和见证了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，也深知困境与短板。“当前科普最显性的困难，是专职科学教师资源短缺。”小学科学课虽已提前至一年级开设，但仍非主课，不纳入考试，师范院校缺少对口专业，大量科学教师非科班出身、缺乏系统培训。

周忠和深感全民科学素养提升任重道远，他接触过不少名人、专业科研人员，发现他们尚未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。“他们只是本领域专家，不代表拥有完整科学思维。”

如何鼓励更多科学家投身科普？在他看来，中国不缺科普受众与市场，打造科普人才队伍，关键在营造重视科普的社会氛围，需要政府、市场、个人三方协同。比如，真金白银投入，完善教育设施、提高科普从业者待遇、打通职称与发展路径等，让作科普“有意义、有奔头”，而不是可有可无。

他从自身经验出发，发现利用学术会议、调研间隙作科普，是一个好办法。周忠和反对千篇一律的科普内容，认为基层科普不必照搬大城市模式，应因地制宜探索。“山东有丰富的地质资源，孩子能接触化石、岩石，就是最好的科普素材；平原地区化石少，观察小鱼小虾、草木植被，同样能激发好奇心。”

## 面孔



### 常兰藻：银发古籍“校书官”

今年74岁的常兰藻在退休后成为一名在网上校对古籍的“校书官”。4月11日，在“我用AI校古籍”2026年启动仪式暨“海外汉籍资源汇聚与典籍活化前沿论坛”上，常兰藻作为“校书官”代表进行分享。

年轻时，常兰藻自学C语言，为所在单位开发对账系统、管理程序，成为中国最早一批“程序员”。退休后，他想做点事情，遂决定回归传统文化，研究古籍。对没有古汉语基础的常兰藻来说，要入古籍的门并不容易。一开始他被古籍中的文言文、繁体字、异体字以及竖排版式卡住，阅读进度停滞不前。后来一次偶然机会，他了解到识典古籍平台，开始在网上海校古籍。他的第一份任务是校正《新编古今事类聚》，即便阅读难度适中，对于新手来说仍充满挑战，他坚持了两个月才完成这项任务。

每天，常兰藻都会雷打不动地花两三个小时校古籍。校对时，他仍保持着工作时严谨的态度，逐字逐句核对，不跳字、不跳行、不跳页。他说：“程序错了跑不起来，古籍错了，后人就会读错历史。”



### 郑嘉励：考古是为了理解鲜活的人

“打开南宋的衣橱”展览于3月底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。该展览以浙江台州黄岩赵伯澐墓、福建福州黄昇墓出土的服饰文物为主，展现宋代丝绸服装的精湛技艺和艺术审美。作为策展人，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、郑嘉励曾于2016年主持赵伯澐墓的发掘工作。在发掘过程中他坚持用电动钻对棺木钻孔，释放积水，从而保住了棺内的丝绸文物。

郑嘉励从事考古与写作已有三十年。1995年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，他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。起初他做史前考古，参与了良渚、河姆渡遗址的发掘；几年后他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历史时期，转而从史前考古；又过几年他再次改换跑道，由之前的热门研究方向转向冷门的宋代墓葬和城市研究，这一研究就是二十年。他花费大量时间调查，发掘浙江的宋墓，曾发掘过绍兴宋六陵，南宋大儒吕祖谦墓，南宋权相史嵩之墓等历史名人墓。他认为，古墓是认识历史、体验人生的好素材，一方面映照着古人思想的变迁，一方面能帮助人们认识自己。

从事田野考古多年，郑嘉励写作了多本本专业或面向大众科普的书籍，比如《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》《读墓：南宋的墓葬与礼俗》《考古者说》《考古四记：田野中的历史人生》《朝东屋：一个村庄的百年微澜》等。通过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学，郑嘉励认为：“考古不只是面对遥远的未知，更是为了理解鲜活的人，以及他们的生活、情感和时代。”



### 王珮瑜：京剧不老

4月11日，在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京剧嘉年华首场快闪演出中，瑜音社京剧小科班的小演员表演了一段少儿京剧《卖水》。瑜音社成立于2015年，由京剧老生演员王珮瑜创办。对这种快闪表演模式，王珮瑜认为，戏剧本出自田间地头，走进戏园子、大剧院都是后来的事情，快闪表演更像是戏曲艺术再次回归大众生活。

王珮瑜是新中国成立后专业院校培养的第一位女老生，京剧余派第四代传人。作为著名京剧演员，她曾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、白玉兰戏剧主角奖等奖项。她被大众熟知，则是因为她不断探索京剧的可能性，尝试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推广宣传京剧，想为京剧在当代人的生活里占个座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王珮瑜参加多档综艺节目，入驻各视频平台，逐渐变为人们熟知的“瑜老板”，堪称京剧界的“流量担当”。2026年春节期间，她与张含韵在戏曲晚会合作京剧戏歌《海棠花开》，引发热议。王珮瑜认为流量是好东西，但要心存敬畏，不要被流量绑架。她有自己坚持，“不为流量扭曲艺术本体，不为数据透支演员身心、不过度传播戏曲演员的苦难。”

对京剧等戏曲在传承发展上面临的困难，王珮瑜认为，戏曲有自己的生命周期，会用当下时代人们喜爱、接受的方式继续活下去，因此不应对其发展悲观、沮丧，要直面困境，并想办法改变。在她眼中，京剧不老。

(□记者 梁雯 整理)



▲在山东省天宇自然博物馆展厅内，周忠和为小学生们讲解化石。  
▶周忠和1990年发现的燕都华夏鸟化石



## 4 传递科学精神

当下，传播手段日益丰富，AI浪潮席卷而来。当AI能快速生成科普内容、构建虚拟科普场景，甚至模拟科学家授课时，科研人员在科普领域的价值，是否会受到冲击？

周忠和坚持认为，AI只是工具，而非替代者，科普的核心永远是人，是科学精神的传递。

周忠和一直强调科学文化培育的重要性。他曾说，科学家不仅要有对科学的执着精神，还要富有人文精神。若科普教育仅关注科学的实用性，而忽视其与人文精神的结合。这样的科普教育，在他看来也不能算成功。

科普的核心不仅是知识灌输，更重要的是传递科学精神——尊重事实、理性质疑、尊重规律，以及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。这是周忠和反复提到的。这需由科研人员亲身参与。那些富有人文温度的表达，融合了自身经历的知识趣闻，都是AI科普无法复制的。

这些年，周忠和也在调整科普方式，融入进化生物学、地质学等自然与人文交叉的内容，通过讲述丁文江、赫胥黎、达尔文等科学家的人生故事，串联起知识点，既有广度，又更生动。持续做好科普的“诀窍”，在于不断

早已超越最初的“自我表现”，成为他锻炼表达、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。

现在，周忠和很少写文章专门介绍某个知识点。他的科普内容变为给同行写书评、推荐，做视频访谈、直播，参加读书活动、科普讲座等。作为全国政协常委，他多次提交提案，呼吁并推动科普法修订。

“相较写文章、书籍等传统形式，现在的科普形式灵活、渠道多元，既受观众喜欢，也能适应快节奏的信息传播环境。”周忠和欣然接受这些新兴的科普方式，但对流量这件事并不敏感。除了兴趣点不在此，也确实无暇顾及，“让愿意做的人去做就好”。

竺可桢先生在1935年提出，科学精神就是“只问是非，不计得失”，是一种超越功利主义的科学观。周忠和说，科学家作科普，一定是出于社会责任，但也不必包装得太伟大。相反，他作科普，恰恰出于“功利心”。“作科普可以反哺学科发展，学科发展进步，对全民科学素养的提高就有帮助。”在他看来，古生物学容易被人忽视，有关生命、进化的内容虽然精深却不高深，公众和媒体感兴趣，科普自然成为双向奔赴的结果。